

文学问题争鸣集

蔡运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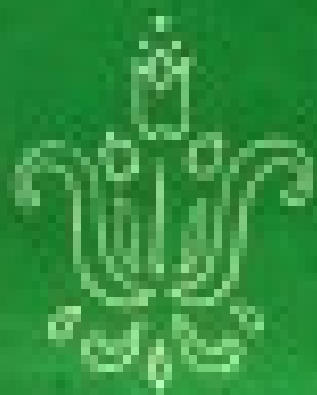


华南师范学院

科学研究所

文學問題年稿集

蕭軍著



文学问题争鸣集

蔡运桂

华南师院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

前 言

本书所收文章，除第一篇外，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写的。这是贯彻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的产物。书中所涉及的，都是文艺理论中较为重要的、常常引起争论的问题。作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大胆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文章分为论文和作品评论两个部分，基本上是按照写作时间先后编排的。从写作时间看来，既反映了作者对文学问题的认识过程，也表现了作者的思想局限。

为了让读者了解我国近几年来文艺界争论的情况，作者特地编写了“文艺界争论的十大理论问题资料”。这些资料，绝大部分来自中央和地方的科研单位编的内部刊物。有的在原有资料的基础上作一些增删，有的作了重新综合整理，客观地介绍文艺界争论的各种观点，这是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所取得的成果。

本书从论文到资料都贯穿着自由讨论的民主精神，对于广大文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由于作者水平低，在理论上自然有许多错误之处，望读者批评指教。

作者1982年8月15日

目 录

前 言

谈文艺表现阶级斗争问题	(1)
论文学中的感情	(14)
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对话	(26)
悲剧的定义及其他	(41)
文学反映生活本质问题再探	(52)
创作自由与审查制度	(65)
——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札记	
在四个坚持中贯彻“双百”方针	(76)
文学的党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81)
论文学表现人性美问题	(93)
文艺批评标准述评	(111)
作家的世界观与作品的思想倾向	(124)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札记	
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	(135)
——读《“打呼噜”会议》想到的	

对比烘托，形真情深	(139)
——谈《火红的秋叶》	
从纵情歌唱到深沉思考	(145)
——谈钱超英诗歌创作的得失	
划清两种人道主义的界线	(151)
——谈《人啊，人！》的人道主义问题	
一部有严重思想错误的作品	(155)
——评长篇小说《春天的童话》	
附：文艺界争论的十大理论问题料资	(165)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165)
艺术典型问题	(174)
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问题	(184)
文艺反映社会生活本质问题	(195)
现实主义问题	(202)
悲剧问题	(211)
人性、人道主义问题	(221)
“共同美”的问题	(232)
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	(242)
艺术规律的若干问题	(248)

谈文艺表现阶级斗争问题

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必须表现阶级斗争，这是毫无疑问的。“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正确地反映特定时期的阶级斗争现实，揭示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尽文艺反映现实，帮助人们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崇高使命。但是，在“四人帮”统治的文坛里，文艺表现阶级斗争却纳入他们的阴谋政治的圈套，成为阴谋政治的图解。使许多作品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百花齐放没有了”，题材、体裁、风格多样化被取消了。文艺作品只能按“四人帮”臆造的公式如法炮制。这样的文艺，不是来自现实生活，而是来自“理念世界”，它没有真实性，缺乏动人的感情和艺术魅力，不能给人以艺术感染和思想教育。它是从阴谋政治中脱胎而来的阴谋文艺，假文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告诉我们，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在这种社会中，“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也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所以文艺家总是根据一定阶级的立场、观点去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一定

阶级的思想感情、意志和要求。但是，这种反映和表现决不是阶级斗争规律的图解，而是以感人的艺术形象去展示社会生活的风貌，正如毛主席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同时也应该看到，文艺反映阶级斗争，也不是要求每篇文艺作品都完成揭示阶级斗争规律的使命。列宁称赞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俄国革命的镜子”，“创造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这是对托尔斯泰的大量作品的概括，并非说每篇小说都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由于文艺作品是多种多样的，体裁和题材的不同，所容纳的内容和表现的形式也不同，有的是描写革命斗争全过程的宏篇巨著；有的是描写一个侧面，表现革命斗争长河里的一个浪花的短篇小作品；有的是革命斗争胜利的进行曲；有的则是表现革命斗争遭到挫折，英难人物壮烈牺牲的悲剧；有的表现人民抗击拿枪的敌人，描写炮火连天的阵地战；有的则表现人民击退糖衣炮弹，打思想仗。……总之，就是通过多种多样的文艺作品，展示某一时代阶级斗争的总形势，揭示出阶级斗争的规律、特点，使人看到人民必胜，反动派必然灭亡的逻辑。

“四人帮”在文艺作品如何反映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划好了一个所谓“三突出”、“三陪衬”的“棋局”，并定出了三条不能违背的“原则”：

第一，所谓以英雄人物为中心进行布局。无产阶级文艺，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这是理所当然的。早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西欧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工人阶级已经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但是当时的文学家并没有注意表现工人阶级

的斗争，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评当时德国的那些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作家，“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而去“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处在资产阶级统治时代，工人阶级要在文艺中占一个位置是很不容易的事，只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文艺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才取得合法地位。我国解放后十七年许多优秀文艺，就是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文艺，真正体现了无产阶级不仅是历史的主人，而且是文艺舞台的主人。但是“四人帮”不顾历史事实，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文艺。江青说什么“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什么“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四人帮”对解放后十七年革命文艺进行了一番无中生有的攻击之后，以“最最革命”的面貌出现，提出什么“根本任务”论和“英雄中心”论，胡说什么以“英雄人物为中心进行布局，摆正了他和其他人物之间突出和陪衬的关系”（江天《让工农兵英雄形象牢固地占领故事片阵地》）。“四人帮”所宣扬的所谓“英雄人物”，并非什么艺术典型，只不过是“路线”、“主题”的传声筒而已。他们鼓吹“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落实到从创造英雄人物出发，按英雄人物的需要进行谋篇布局，编造故事情节，安排正、反面人物和主、次要人物，甚至规定了英雄人物和反面人物在作品中的比例，在舞台上所占的位置等等。总之，英雄人物在中央，反面人物靠边站，其他人物绕着转，英雄人物“高、大、全”，其他人物作为垫脚板。否则，就是违反“英雄中

心”论，是什么“以邪压正”，“牛鬼蛇神占领舞台”，“坏人专政”，是大毒草。

“四人帮”这伙自称“文艺旗手”、“理论权威”的骗子，对文艺创作的规律简直一窍不通，他们竟然把无产阶级占领文艺阵地同舞台上英难人物占据中央等同起来。江青在谈《智取威虎山》时就蛮不讲理地要座山雕的位置往边靠，越靠边越好，否则，就是“反面人物为中心”，“坏蛋占领舞台”，岂不是荒唐可笑吗？我们认为，无产阶级占领文艺舞台，从根本上来说，是体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表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固然体现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必须看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创造一个凶残而怯弱的敌人形象，并无情地揭露之，岂不是同样体现了为人民服务吗？短篇小说《伤痕》，写的是一个普通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遭遇，它却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迫害老干部和宣扬“血统”论的罪行，不是很好地体现了为人民服务吗？如果按照“四人帮”的“占领”论，认为只有“以英雄人物为中心”，才能算为无产阶级占领，以此类推，鲁迅的《祝福》、《药》、《阿Q正传》等，究竟是谁占领呢？是鲁四老爷还是祥林嫂？是康大叔还是华老栓？是赵太爷还是阿Q？至于今天的一些政治讽刺作品，岂不是群丑“占领”了吗？由于“四人帮”极力推行这种“中心”论，“占领”论，导致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路子越来越窄，只许作家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不许作家精心刻划各种各样的人物，所谓“英雄典型”，根本配不上艺术典型，只不过是一种没有血肉的、打上无产阶级标签的类型而已。“四人帮”的这种人物塑造“模式”，造成人物塑造的

概念化、公式化、划一化和文艺表现阶级斗争的简单化，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

第二，所谓英雄人物不能牺牲。江青胡说什么“塑造起一个英雄形象却让他死去”，这就是“人为地制造悲剧结局”，“宣扬革命斗争的苦难”。“四人帮”，这条不准写英雄人物牺牲的“法规”，是对阶级斗争规律的歪曲，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背叛，是“精神胜利”法在文艺创作中的一种表现。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曲折的，你死我活的，无产阶级文艺必须真实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现实，决不能回避革命斗争的艰苦性。不表现艰苦性，又怎样进行革命斗争的传统教育呢？解放后许多描写英雄人物牺牲的作品，如《刘胡兰》、《董存瑞》、《红岩》等等，都有着巨大的鼓舞力量。它并不因为写了英雄人物牺牲而使人灰心丧气，相反，却鼓舞人们为完成英雄未竟的事业而斗争。江青胡说什么写英雄的牺牲，就是宣扬“苦难”，这是十分荒谬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苦难在人世间是客观存在的东西，问题在于你如何对待这个“苦难”。无产阶级要战胜十倍甚至百倍于自己的敌人，有的在战场上牺牲了，有的被投进牢狱，遭到酷刑。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过程中，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饥饿和疾病，有的沉没于沼泽，难道这不是“苦难”而是象朗诵诗那样的抒情愉快吗？正是由于旧社会的劳动人民过着苦难的非人生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劳动人民摆脱这种苦难而赴汤蹈火，进行英勇的斗争。今天我们要用文艺作品真实地表现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对幸福的年青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在“四人帮”所控制的文坛里，我们所看到的许多文艺作品，根本不正视革命斗争的艰

苦性，不惜歪曲现实生活的真相，人为地制造一个“光明尾巴”，给人以虚假的印象。古代神话传说中当英雄人物遇难之际，往往有神仙援救，这是人类缺乏文化科学知识的蒙昧时代的反映。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所以，作为反映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果把英雄写成履险如夷的“超人”的“神仙”，那就不真实了。但在许多文艺作品中，确实看到不少这样的英雄：枪打不中，刀砍不进，单枪匹马，昂首挺胸，用革命口号把一群敌人吓得趴在地上，多么象头有灵光，口有符咒的“神仙”！这种制造“光明尾巴”，宣扬廉价“胜利”的作品，不仅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的阶级斗争，而且对人民群众有麻痹作用。不仅反映民主革命斗争的作品，不能回避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和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作品，也应该这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残酷的阶级斗争。打倒了“四人帮”，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会有艰难曲折。要想不经受困难和挫折，舒舒服服和和平平地取得伟大胜利，在过去未曾有、在将来也不会有。我们的文艺作品，要敢于表现我国人民在经受各种困难和挫折中前进的斗争现实，摒弃“四人帮”那种不准写悲剧，不准写苦难等等“法规”，才能真正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

第三，所谓表现阶级斗争就是表现敌对阶级的直接冲突。“四人帮”无视现实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文艺作品反映阶级斗争的多样性，把文艺作品表现阶级斗争，看作绝对表现敌对阶级的直接冲突。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偶有违反，

就大兴伐罪之师，把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或间接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都被扣上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和“中庸之道”的大帽子，统统加以枪毙。在这种论调影响下，有的作者，在进行文艺创作时，为了避免帽子和棍子，只好千篇一律地编造阶级斗争故事，不论是写什么样式的文艺作品，几乎都是“戏不够，敌来凑”。反映工厂出事故的，必然是反革命技术员或者资产阶级专家在暗中破坏；反映商业出问题的，必有投机倒把分子在作怪；反映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必有地富分子在背后挑拨；表现学生顽皮，无心向学的，也因阶级敌人在唆使；描写抗洪斗争的，一定要写阶级敌人在雷雨交加中进行破坏，否则是“只见水情，不见敌情”。俗话说：“无巧不成书”，在“四人帮”那里则变成“无敌不成书”。他们表现阶级敌人，也有固定的公式，当你在戏院或电影场听到刺耳的音乐，看到灰暗的灯光时，就有一个身穿黑衫，头戴毡帽，三角眉，歪嘴巴，弯腰曲背而行的人物出场，小孩子们就不约而同地叫嚷“老阶分子出来了”。“四人帮”把这种表现阶级斗争的格式，总结成为所谓“从纲上线上找题材，写人物”的经验。他们所控制的刊物发表了一篇题为《小戏创作的可喜收获》一文，就是宣扬这种所谓经验的典型。文章说：“剧本的修改，遵循着党的基本路线，把原来在剧本中没出场之王有财这一人物，从富裕中农改成摘帽地主，这一修改起了重要作用”，即“抓住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弄清了地主在背后破坏，利用拣‘地脚’来挖集体经济这一事情的真相”，“使主题思想更具有普遍意义”。这里把摘帽地主与不法地主混为一谈的错误尚且不说，而改了一个人物的成分，就有如此“可喜

收获”，意义就如此“重大”，其秘诀在那里呢？只不过是符合“四人帮”所设置的所谓阶级斗争“棋局”而已。这种制造公式化作品的“经验”，成了小说、戏剧、电影等创作的枷锁，有的文艺工作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袭用了这套货色，驾轻就熟，粗制滥造，反映阶级斗争的作品，几乎是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样品。他们不敢写人民内部矛盾或不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创作上碰到困难，就只能请出阶级敌人出来圆场。弄得作品千篇一律，毫无生活气息，既无助于人们对现实的认识，又不能给人以才能、智慧。“四人帮”把文艺表现阶级斗争搞得如此简单化、公式化，我们一定要在文艺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进行彻底的清算。

社会主义文艺能否正确表现阶级斗争问题，实际上是文艺如何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的问题，也就是能否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问题。文艺反映现实生活，固然要经过典型化的艺术手段，使作品中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但是这种典型化都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基础的。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纷纭复杂，千变万化，不仅表现在政治上敌我双方的激烈搏斗，而且也表现在经济领域或思想领域。《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追求林道静，不是他想把妻子作为“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本性的暴露吗？他们婚后的家庭纠纷，不是表现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吗？电影《李双双》中的李双双与喜旺和部分社员之间的矛盾，不是表现了以李双双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农民的先进思想与小农思想的斗争吗？文艺创作的实践充分证明，文艺表现阶级斗争的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直接表现，有的间接表现，有的出现阶级

敌人，有的没有出现阶级敌人。文艺作品的高低好坏，不在于它是否表现阶级斗争，而是在于它怎样表现阶级斗争。描写同阶级敌人直接冲突的作品，固然表现了阶级斗争，但并非都是好作品；而没有出现阶级敌人的作品，能够表现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或思想领域里的反映的作品，也不失为好作品。例如刘心武同志的短篇小说《班主任》得到人们热烈赞赏，但它既没有出现一个阶级敌人的形象，也没有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中塑造人物，而是塑造了一个坚持平凡教育岗位，对培养年青一代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人民教师张俊石。他是脚踏实地的、受到人们敬佩的人物。作品刻划了两个受“四人帮”的毒害而思想、性格完全不同的青年学生：一个是鄙视一切文化科学知识，满身横肉的流氓宋宝琦；一个是努力学习，对“四人帮”鼓吹那一套坚信不移，思想僵化了的“模范学生”谢惠敏。作品就是通过对这些人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描写，真实而深刻地表现了无产阶级同“四人帮”争夺青少年一代的阶级斗争，控诉了“四人帮”破坏教育事业、坑害青少年一代的滔天罪行。这样的文艺作品，才真正是表现了阶级斗争，在人民群众手里，成为跟“四人帮”作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在教育战线拨乱反正中起了冲锋号的作用。它使那些描写歪头缩颈的阶级敌人跟在青少年背后鬼鬼祟祟唆使人干坏事的作品相形见绌。

象《班主任》这样的优秀作品还告诉我们，反映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就是要教会人们善于和敌人展开斗争，不仅要善于和公开的敌人作斗争，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善于和隐蔽的、形形色色的敌人作斗争。这样才不致于使人们在伪装的阶级敌人面前失去辨别力。我们必须坚决抛弃“四人帮”强

加给文艺工作者的那一套所谓阶级斗争“模式”，而要按照现实生活来反映阶级斗争：既表现阶级斗争的复杂、艰苦和残酷，又表现革命必胜的规律；既表现敌人的阴险、狡诈，又表现人民的大勇大智；既表现枪林弹雨、刀光剑影的阶级斗争，又表现“软刀子”割头的阶级斗争。这样，才能使人们从文艺作品中吸取斗争的智慧，才能使文艺作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

粉碎“四人帮”两年来，文艺战线做了大量拨乱反正工作，狠批了“四人帮”的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初步清除了“四人帮”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影响，使许多文艺工作者思想得到解放，社会主义文艺花园里出现了一大批赏心悦目的新花。如小说《班主任》、《伤痕》，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为了周总理的嘱托》，话剧《丹心谱》等等。这些作品的主要特色是敢于抛弃“四人帮”的陈规戒律，冲破“四人帮”设置的文艺“禁区”，大胆地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喊出了中国人民多年来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声音。它们敢于正视现实，按照生活原来的样子，热情地歌颂光明，无情地揭露黑暗面，表现了艺术家的勇敢和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力。《哥德巴赫猜想》和《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以真人真事为题材，描写文化大革命的“台风”对中国人民的冲击和考验，数学怪人陈景润，既受种种折磨、凌辱，又能钻进“台风”中心的静谧处去摘取“数学皇冠”上的“明珠”；而育棉土专家吴吉昌却被推到风口浪头上，几乎粉身碎骨。人们看到这些为祖国文化科学事业而战斗不息的人物，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的情景，谁不感到惊心动魄，为之流下同情之泪，又谁不对林彪、“四人帮”感

到无比义愤呢？这些作品贵在真实，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敢于把那些泛起的沉渣、翩跹的魔鬼，“权力使人昏迷”，“派性叫人发狂”的污浊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为扫除林彪、“四人帮”的垃圾而斗争。受到观众热烈赞扬的《丹心谱》，它好就好在摆脱了“三突出”、“三陪衬”的帮公式的禁锢，真实地反映“四人帮”对我国医疗科学事业的破坏，揭露了“四人帮”攻击“03”科研小组，背后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险恶用心。它既没有塑造什么超凡入圣的所谓“英雄典型”，也没有制造蛇头鼠脑的敌人形象，而是以一批现实生活中“似曾相识”的人物，表现出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作品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揭露在“四人帮”控制下的某医院，是非不明，人妖颠倒，坚持正确路线的党委书记李光被撤职下放，附焰趋势，看风驶舵，卖身投靠“四人帮”的庄济生被提拔重用。他们摧残人才，毁灭科学事业，使一批热爱祖国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的知识分子怒不可遏。这是当时卫生战线阶级斗争的缩影。作品以一个热爱周总理、热爱科学事业的老知识分子方凌轩作为主人公，也没有表现方凌轩等正面人物在斗争中取得最后胜利，而是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消息，用震惊人心的哀乐作为剧情的结局。在这个带悲剧气氛的结局中，剧中人哭了，观众也哭了。既表现了“03”科研小组的同志们对周总理的一片丹心，更重要的是歌颂了周总理关心祖国医疗事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一颗耿耿丹心。当这一颗丹心受到“四人帮”摧残时，人们怎能不痛心，不气愤呢？观众透过泪花，想到的是“四人帮”对方凌轩等的进一步迫害，残酷的